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芳上博士

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1900s-1920s)

柯惠鈴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芳上博士

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1900s-1920s)

柯惠鈴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從閩秀到女傑：晚清革命中的性別再造	17
✓第一節 母強與國強的想像	17
✓第二節 清末革命政治中的「女傑」	39
✓第三節 從閩秀到女志士	60
第三章 衝決父權：改造社會中的新女性圖景	80
第一節 都市性別新景觀—「女學生」的構成	80
✓第二節 改造女子，改造社會	102
✓第三節 打出象牙塔—愛國運動與女子覺醒	127
第四節 何處是歸程？	150
第四章 運動婦女：革命動員與性別政治	171
第一節 從女權運動到女工運動	171
第二節 運動婦女	196
✓第三節 政治與性別結盟？	219
✓第四節 「性」成為國家資源	255
第五章 結論	282
徵引書目	292

第一章 緒論

(一)

約翰·費茲傑羅 (John Fitzgerald) 以近代中國「覺醒」的過程為主旨，研究革命與文化關係時，曾提到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整個處境中，覺醒一詞可以被理解為中國的民眾在一個漸進的過程中認知到他們的民族性 (nationhood) —— 這個過程牽涉到大眾流行及品味的改變、對個人身份 (person identity) 和生活意義上逐漸增強的探索慾、涉入與殖民種族主義有關的紛雜判論、以及快速商業化、工業化的積累影響¹，由此他指出文化與革命形成桴鼓相應的結合。也就是說中國革命以建造一個「新國家」為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介入與引導文化領域的諸多演變，二者組合而成的對稱性 (symmetry) 表現在美術、建築、博物館和醫學、小說、散文、雜誌、宣傳、政治制度及群眾組織上²。在這個分析中，作者提出自晚清以降所開展的近代中國革命，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國族國家 (nation-state)，而國族國家的打造除了直接訴諸於政治運動外，在文化上也試圖創造有別於傳統的新面貌，顯現一個符合新國家的新文化。

許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傾向於將國族主義的興起視為 20 世紀初的「現代景觀」 (modern phenomenon)³，即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將傳統中國的文化認同主義 (

¹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² Ibid., p.6.

³ 引自杜贊奇的評論。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6), p.32.

culturalism)⁴轉變成爲國族認同主義(nationalism)⁵，例如研究梁啟超的思想演變，列文孫(Joseph R. Levenson)描述了梁氏如何替自己闢出一條由文化主義到國族主義之路⁶。19世紀中葉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在求強求變的深重危機感驅使下，許多知識分子已逐漸相信中國需要一種現代意義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⁷，藉此以抵抗外國勢力，而這種現代國族主義其精神包括拒斥傳統許多成份和文化意義上的國族屬性(nationhood)⁸，由於一種潛藏的傳統專制及現代民主的二分法意識，使得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如何轉變傳統、再造文化成爲爭論中心。隨著1905年滿清廢除科舉，各種新式學校的設立，鬆動了傳統天朝統治的社會結構，而立憲與改革

⁴ 按照哈理遜的解釋，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可以通稱爲文化主義(culturalism)，它的基礎是一個共同歷史遺產和承接的共有信仰，不像國族主義的基礎是現代概念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James Harriso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 1969), p.2.

⁵ 關於西方學者討論及引用「文化主義至國族主義」(culturalism-to-nationalism)的學說，湯恩森有詳細的介紹。文化主義主要指帝制中國自秦漢(221 B.C.)以降，發展出來以文化爲主的認同方式，除了文化承續外，沒有其他中國主權政體(Chinese State)或國族(Nation)的概念。而國族主義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接觸西方文明、和西方勢力入侵後的產物，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反對帝國主義和救亡、再造國家的傾向。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2-6. 本文對於「文化主義至國族主義」學說的引用，仍依既有的普遍解釋，即將文化主義區辨爲重要的儒家中國形象，也就是以文化界定的共同體(culturally-defined community)，不同於種族界定(ethnically-defined, racism)或是政治界定(politically-defined, modern nationalism)的共同體形象。

⁶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108-122.

⁷ James Townsend 對於「文化主義到國族主義」的批評指出，這個理論的主要缺點是視轉變爲「通體」與「絕對」，也就是一方面過度強調帝制時代文化主義的控制力及前現代國族主義的弱化，同時復過度強調現代之文化主義的褪逝及國族主義的勝出。與前述相反，文化主義可以與其他概念，諸如國家、國族等並存，甚至到了現代，文化提供國家及種族國族主義者各種奧援。文化主義和國家國族主義可能在各自領域中宰制著英們的信念，但他們二者卻從未獨霸有關中國國族思想和情感。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24. 筆者基本上參考了這個對於文化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修正觀點。

⁸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ol.1, pp.98-104.

活動的開展，使得社會出現一批新的菁英階層⁹，接二連三的對外挫敗，使得政治隨同文化都在劇烈救存中流動。革命主義者以反滿爲政治訴求，將種族中心(ethnocentric)說提升至革命思想的中心位置，其方式不在拋卻傳統文化，卻是將文化移作國家操作(operating)的對象，成爲政治的工具之一，國家的建造反轉傳統中國以文化爲主的認同，將國族置於文化認同之上，這過程或可解釋爲文化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culture)¹⁰，而這種革命的政治文化與國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興起有密切關係。

革命所強調的共和、民主概念，推翻了傳統天子的權威來自於天命的說法，伴隨著新知識傳播對官僚體系的衝擊，在宣傳人民參與政治的合法性時，開啓了新的政治文化出現的契機。Henrietta Harrison 認爲在探究中國民族性意義的演變時，不應只是注意一種新的意識型態的發展和對民眾的灌輸，重要的是一個文化形成過程——在其中，所有創造者、傳播者和接受者通通涉入並共同形塑新政治文化的屬性¹¹，這個說法無疑地提供研究晚清政治運動與民眾間交互影響的重要依據。Lynn Hunt 研究法國大革命，也提出政治對於形塑一般百姓生活的重要¹²。在承認政治文化是爲一種機制，而中國革命的歷史也就呈現了一個記憶與忘卻的特殊敘事方式，也就是關於革命進程的歷史敘述夾雜著事實與詮釋兩個面向，革命所獨有的歷史語境是不得不審慎細辨的問題。

在國族主義蘊育下的政治文化，具有重新定義社會角色的作用，對於性別論述的形成有其重要意義。革命以許諾、號召、命令等特有言說方式，表現對家國的強烈激情與熱愛，其所宣揚的民主被知識婦女所吸收，而經由轉換滿清異族的政治專

⁹ R. Keith Schoppa,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Zhejiang, 1909-1927",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p.506-509.

¹⁰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32-34.

¹¹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

¹²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213-236.

制/傳統社會婦女所受的壓迫的相應性上，性別議題在激烈變革的呼喚中被提至與政治革命彼此互相糾葛、映照¹³。透過這種性別重現引發性別再造，無疑地對於女權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個革命與性別的互相斡旋，乃至彼此相互界定的過程，始自清末國族想像中所發展出來的對於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認識，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學說的影響所形成的世界觀 (worldview) 帶著強烈的不可逆轉的直線進步史觀取向¹⁴，環顧列強所處的世界中，知識分子趨向將中國當時所追求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變革，援附與西方相通的各種普同化 (universalizing) 的現代概念，以「婦女」為例，「婦」在強國保種的改革者心中，不是指個別能力差異、對於生存有獨立策略的個體，而是一個整體單元¹⁵。對這個整體單元的一般概述，強調是國家富強至上的意識而非以爭取婦女個別權益為目的，但其所倡導的女學卻表現了集體想像與個人實踐的交

¹³ 當時宣傳革命最具激烈色彩的《女子世界》，引自王忍之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936。有亞盧（柳亞子）所寫的〈哀女界〉通篇充滿反滿革命的激越語調。「吾敢披髮裂喉，以告我二萬萬同胞女子。曰：嗟嗟！公等之束縛馳驟二千年于茲矣，奴隸于禮法，奴隸于學說，奴隸于風俗，奴隸于社會，奴隸于宗教，奴隸于家庭，如飲狂泉，如入黑獄。……今日何日？此公等沉九淵，飛九天，千鈞一髮之界線也。公等而不甘以三重奴隸終乎？則請自奮發、請自鼓勵、請自提倡、請自團結，實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婦女在種族革命中的定位是三重奴隸，政治宣傳促其對自身處境不該繼續緘默。

¹⁴ 本杰明·史華茲著，葉美鳳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84-104。

¹⁵ 劉人鵬指出近代中國在追求富強的現代化進程時，具有主體發言位置的男性菁英知識分子落入帝國/國族二元論述的框架中，並置身於非西方的一端參與建構了帝國長生不老的想像中。而婦女在這個論述框架中，被召喚成為現代化議程中的一環，男性知識分子將婦女作為落後、弱惡、貧窮、殘廢等國族想像的具體呈現，藉此男性主體抒發弱勢處境的焦慮，表達被征服者欲居於征服者的慾望。參見氏著，《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學生書局，2000）。筆者基本上同意劉人鵬的研究，惟近代中國有關婦女解放的言說本身即是婦女解放史的一個重要組成，但絕非全部。雖然作者也注意到必須考慮到婦女在不對稱的男/女結構中，也還是具有主體能動性。而這個主體在權力結構中所發揮的交涉能力及共同涉入建立男/女對稱（或不對稱）的權力體制，顯然是在過去研究婦女解放中較被忽略的，筆者即試圖在以女性為書寫主體的文本中，利用主客易位的方式，來重新尋找中國婦女運動的內在脈絡，即不論婦女運動的斷裂或連續，都不能忽略女子亦是具有性別策略的個體。

互影響，先覺婦女乘改革的時代風潮進入社會活動中，遂使近代婦運在男性架構的整體與婦女主體意識的覺醒交織下變動前進¹⁶。

婦女運動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後，注入了新的元素。如同一般對於五四女權運動的理解，當時蓬勃發展的各種刊物多將婚戀問題、社交公開、教育平等、職業開放等與婦女相關問題納入討論¹⁷，在在顯示知識分子受到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洗禮後對於個人獨立、自主的追求。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政治上的裂解，知識菁英對於中國社會改革的關注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對於平民教育的重視與喚醒民眾的呼籲頗盛於一時¹⁸，進一步促成社會運動的發展，婦女運動在此歷史條件中亦注入新的動能。改良社會者提出支援婦女進入公領域的各種論述¹⁹，但由於男女所憑藉的社會生存條件根本不同，五四男性知識分子的改良言論中，其主要內容常常更強烈表達的是對傳統封建禮教觀念的攻擊²⁰，而在談論婦女性別處境時其觀察的角度更接近於是男性自身對於傳統、對於社會的改革觀點，甚至合法、合理地在打造另一種新的社會性別階序，婦女在公共空間的現身及其社會待遇仍是頗受限制²¹

¹⁶ 革命婦女的思想行為與其同時代婦女相較，多數具有開路先鋒的前導作用。清末留日參與政治活動的女留學生尤其顯著，她們在日本接觸到有關中國國族主義爭論的議題，與男性知識分子共同處於救國氛圍中，以參與和論辯如何延續國家命脈為使命自任。Joan Judge, "Talent, Virtue, and th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6, No. 2, (June 2001), p.785.

¹⁷ Chow Tse-tung,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15-19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8. 曾舉出五四時期有四百多種期刊出刊。

¹⁸ 許德珩，《許德珩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35-36。

¹⁹ 公/私領域的觀點參照西方學者的分析，即公共領域指政治領域，私領域則與婦女位處的家庭領域有關。見Nira Yuval-Davis,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78-79.

²⁰ 毛澤東對長沙趙五貞的自殺，係藉著討論女權議題呈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女子的弱者犧牲形象，映襯著傳統思想文化的非正義性、不文明性，對於禮教的指責是十分具體且有力。Roxane Witke, "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pp.7-31.

²¹ 王政的研究指出，五四前夕許多來自上層階級家庭的女學生，仍面臨著禮法的限制，不得與家庭成員之外的男性混雜相處。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15. 關於清末以來婦女解放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即下層婦

由於求強的深重焦慮，五四時期輸入中國的西方思想簡直類同「雜貨店」，其中具有激進改革色彩的社會主義學說雜揉著無政府主義精神輸入中國後，頗能吸引一般不滿於中國現狀的改革派青年²²。階級的觀點在中國到底是如何被接受的？尤其是婦女運動是跨越社會多重階層所形成的一個集體動員，性別與階級何者優先決定婦女的身份²³？在這一點上，筆者比較同意 John Fitzgerald 的觀點，即階級鬥爭的分析對中國社會不論是理論的應用或實踐上的操作都不甚合身，反而是建構國族國家的革命目標使得階級劃分與革命運動的推進方式、領導權力爭奪產生密切關係²⁴。如果延伸這個看法，在權力架構中的性別位置牽涉到革命的占領地域（城市鄉村的差異）、女權的奮鬥目標、國族國家統一的慾望等。透過性別的角度可以顯示出中國革命及國家再造的權力基礎，一方面國家揚舉的社會改革賦予婦女活動較自由的空間，性別分工的打破是為一例；另一方面，塑造性別的新處境及新秩序，也正是國家權力顯現之所在，換句話說走出傳統家庭禁錮的婦女，走進了國家整編的國民行列中了，而角色與身份被重新設定，無形中亦褪除了婦女運動的能量。

(二)

19 世紀末在面對一連串西方思潮的衝擊與挑戰之下，正如時人所稱為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在中國引發了各種變化。雖則以中國地域之廣袤，各地區的變化程度及思想、心態或有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思想演變緊密呼應，特別是關於女權問題的提出與論辯。

西方的挑戰迫使中國反省自身的弱點與危機，當時中國各種改革派分子的思想

女率先接受西方傳教士的啟蒙教育，城市妓女的獨立自主，在在開創女性教育、流行、品味的新風氣，正好倒轉了傳統上行下效的社會風習，借用羅志田的研究所提出的看法，這種改變亦可說是「權勢轉移」。羅志田，〈自序〉，《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17。

²²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4-94.

²³ 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p.1-4.

²⁴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 pp.214-260.

是矛盾的，一方面亟欲引進西方學說、思想、制度，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的防堵其在中國的傳佈威脅傳統文化²⁵，因為婦女主要的生命歷程皆環繞著家庭，位居傳承父系文化重要地位，以致對於婦女問題的討論又顯現著對於傳統的焦慮²⁶。是以當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大學設立女學之時，引起了中國朝野的重視²⁷，倡女學之議四起，但究其手段卻透露由鞏固父系傳承入手的傳統理想，這種曖昧性加添了女權思想啟蒙的矛盾，而中國婦女運動及女權問題即在摹仿西洋與救國保種雙重考慮下展開。

其實在 19 世紀前的中國社會中，「婦女」的概念一般並不是被認知為社會屬群的組成。中國傳統社會的「婦女」是一個在家庭中被定義出來的身份²⁸，因為不被

²⁵ 1920 年代，據言當時訪問中國的羅素，仍說中國是一種文化而不是一個國家。羅素所謂的國家或許是根據現代西方近代政治、經濟、社會變化之下所形成的一種「政治實體」(polity)的概念而來，若依此標準，中國當然稱不上是「國家」，但帝制中國早已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有一個承天命的天子建立天朝，與儒家文化結合，四方臣民則以歸順於中國文化與否來決定其是否為共同體一部份。參見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pp.3-6.

²⁶ 婦女的作為在中國士紳傳統中從來就不只是個人意圖的表現，而是統治者展現影響力的地方。進一步而言，透過對婦女某些行為的提倡與表彰可以保持男性宗法社會的穩固，另一方面將婦女納入一個區分範式的「命名」系統中，藉由對女子道德等級秩序安排，也有形塑政權無上力量的作用。見 Mark Elvin, "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no. 104, (1984), pp.111-152. 及 Ann Anagnost, "the Politicized Body",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131-141.

²⁷ 梁啟超語「彼士來游，憫吾窘溺，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桎梏。譬猶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鄰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鄰」。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04。

²⁸ 這個身份來自傳統修辭與社會機制的結合。《大戴禮·本命》中有「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白虎通》中有「男女者，何謂也？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引自班固，《白虎通》卷 4 上，（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頁 18 下。透過這種普同式的泛論，架構婦女典式的造型，它所展現的不只停留於權威話語，而是透過男女相提並論的方式以建構一套男女性別相異的秩序，並合理化男尊女卑的現實。這個操作還透過一套議定的儀節 (protocol) 來決定一個人是誰 (即身份)，及他們的性別角色。這個觀點引用 Tani E. Barlow 的解釋，她認為由儀節規範來決定一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男、女都類似，而這種「性別化」(gendering) 並不參照個人的身體外形，也就是指稱一個人為「女」並不是全然來自他身體上具有的顯著特徵，

允許直接與公共事務產生聯繫，是以經典言論中的婦女通常意指各種血緣戚屬關係網絡中的一個鏈結位置，而中國婦女的角色、地位便由各種禮法倫理規範來決定，婦女個人的主體身份只能在家庭中取得²⁹，其與公領域只能透過男性家庭成員發展出間接關係。是以所謂內外之別便成為基本的性別秩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³⁰，男女之別不可違逆，因為「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³¹。此外亦藉由空間的區限來定義男、女的地位。即「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居門，閨奪守之。男不入，女不出」³²，對於婦女更加強防逾杜閑的作用，「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³³，這一套行為規範不僅是儀節指南，更是定義各種身份的條件說明，換句話說，中國社會中的婦女在家庭之外沒有另外的屬於「女」的地位與身份。

由於清末經濟與社會的變動，在傳統士農工商的社會格局中，增加了許多新的身份如學生。而過去僅僅是「家庭女性成員」的單純婦女身份被打破了，自女學被提上社會改革的議程中³⁴，女學生成為婦女在家庭之外的合法身份。因為 19 世紀中期維新派提倡的女學含有「正本」的思想³⁵，再加上種族意識的覺醒³⁶，婦女的天賦

如小腳或大胸。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u, Guojia, Jiation",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pp.256-257. 另劉人鵬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是一個「階序格局」，夫婦是此種格局中之一種關係。見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頁 1-72。

²⁹ 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u, Guojia, Jiation",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pp.258-259.

³⁰ 《禮記·郊特牲》，鄭玄注，《禮記鄭注》（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 68 年），頁 342。

³¹ 同上註，頁 342。

³² 《禮記·內則》，鄭玄注，《禮記鄭注》，頁 370。

³³ 同上註，頁 355。

³⁴ 根據李孝悌引用李澤厚關於五四運動及其後的思想史發展中呈現的「啟蒙」與「救亡」的兩個主題，認為同樣模式亦適用於清末的許多發展。「由救亡逼出來的啟蒙運動，並不僅限於知識階層。幾乎在同一時候，少數幾個走在時代前端的思想家就已經注意到開啟一般人民智識的重要性」，這個關於時代思潮的介紹同樣可以應用到有關女學興起的解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1 年），頁 12。

³⁵ 維新派對於興女學懷有「正本」的理想，這個正本思想來自於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與責任。婦女的生

角色被強調，是以救國論述中婦女負擔的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³⁷的作用，縱使表達的女權具有功能目的取向，但此點已是有別於傳統僅從家庭中的相對功能結構來設定婦的地位，清末思想中已開始轉移至對婦女生物特質的討論。

救國與女權意識的聯結，在革命活動中進一步加強了³⁸。晚清激進主義宣傳民眾應共同參與政治，將傳統儒教體系中的治者與被治者、年長與年青者、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分野都視作是一種壓迫形式，阻礙了共和民主的發展，這種壓迫懸隔只有依賴稟賦秀異及有決心的個人來克服³⁹，受到這股革命的浪漫氣息所激動，婦女也不禁有「浮槎東渡起雄心」的抱負，政治運動與女權覺醒彼此交會激盪⁴⁰。辛亥革命可

育功能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中是極為重要的價值，相反的，這個婦女天賦的功能也可能是製造紛亂的源泉。Kay Ann Johnson 研究中國農村家庭，解釋了中國家庭父權制的形成與運作情況。宗系、鄉里結合擴展成為一個男性威屬網絡，婦女是男性集團間建立關係的交易品，在這種網絡中處於邊緣位置。農村婦女通常也參加生產，但並無法藉由這種經濟貢獻而改善地位，因為整個「交換婚制」對於婦女是極為不利的。不過，即使在這個環境中，婦女仍不是全然的被制，她們利用了個人關係建立了在家庭外的女性網絡，透過瑣談（gossip）產生社會壓力來影響社區事務，甚至透過母子親密關係形成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ies）來增強個人在家庭中的權力，可見婦女生命週程亦會影響到她對自身權利（力）的改變。參考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關於中國城鄉婦女的地區性發展差異，是在研究婦女問題時必須審慎考慮的一個問題，而除掉地區性差異外，有關經濟分化後社會階層的相異處境也是衡量婦女運動的重要變因。

³⁶ 關於晚清以降對於「種族」及「國族」的爭議，參閱馮客（Frank Diko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115-147。

³⁷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頁 104。

³⁸ 當時主張革命的各種思潮中，最為激進的應是無政府主義，他們反對任何權威統治的存在。何震在東京主持《天義報》，表明自己既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女權主義者，甚至強調女權解放才是真正的革命。她也是第一個把婦女解放與社會階級、經濟獨立並立考慮的先行者。見 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30-131.

³⁹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0-11.

⁴⁰ 關於女權與政治運動的結合，秋瑾的言行中表達得極為清楚。一首寫於留日時期題名〈鷓鴣天〉的詞牌，一方面擺脫了傳統吟風弄月的女性書寫內容，展現了當時愛國犧牲的時代精神，但另一方面則又不免流露對於女子隻身馳赴海外的落寞感。其文為「祖國沉淪感不禁，聞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

以說是中國婦女參與政治運動的初步嘗試，1900年以後隨著東渡日本留學學生人數的增多及上海發展成為繁榮港埠後，東京及上海成為兩個當時最重要的革命活動匯集點，身處兩地的婦女透過與男性的社會交往接觸到當時以革命愛國為訴求的各種政治結社及彼時大量出版的刊物，這對於婦女政治意識的啓蒙具有重大的意義⁴¹。

在袁世凱稱帝後的一段時期，婦女政治運動瓦解消褪。伴隨五四愛國運動，女學生在社會活動中嶄露頭角。在婦女解放的呼聲中造成「性」議題不斷在公共空間展現⁴²，新文化運動帶給婦女新的思考，女性菁英為讓社會接受解放的正當性，發展出五四女性觀「我們的改造，當以社會人群全體利益的幸福做目標」的集體意識⁴³，群體利益成為個體解放的護身符，此即男性和女性的社會待遇差異使然。這個差異在國民革命追求國家統一與社會改革雙重目標下，更顯得政治運動中婦女身份的曖昧。

對於男性革命者而言，階級和性別的統合較為容易，然而對女性革命者而言，性別身份與政治領導綱領間則需要不斷辨析先後的順序⁴⁴。傳統以家庭為婦女人生的

須補，為國犧牲敢言身！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夜上鳴！」。李又寧編著，《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69年），頁133。一個對於清末女子旅遊各國的旅行文本的分析，發現這個時代新、舊交替流動的變化性，單士厘的《癸卯旅行記》（1903年）顯現出一個在舊傳統教育下的上層女子面臨異邦文明的洗禮，在閨秀與新女性的對照中，個人選擇的矛盾性。參考 Ying Hu, "Re-Configuring Nei/Wai: Writing the Woman Traveler in the Lat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8, no.1, (Jan. 1997), pp.72-94.

⁴¹ 如1902年成立於上海的中國教育會，對於女子參與政治革命曾大聲疾呼「欲再造吾中國，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頁6。

⁴² 1910年至1920年，由於男女社交逐漸公開、自由戀愛、擇偶，甚至有關節制生育的討論，妓女行業的馳榮等都表現出對於「性」（sexual matters）方面的公共意識逐漸深化。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34.

⁴³ 向警予，〈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71。

⁴⁴ 王會梧，〈中國婦女運動的新趨向〉指出男工對女工的排擠，這對於婦女社會運動的成軍埋下變數，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

完全角色，雖則活動空間受到束縛，但遭遇的矛盾相對較小。而革命不只將婦女引入公領域中，在革命對文化的滲透中，公領域也不斷擴張其影響及於婦女私領域中⁴⁵，1920年代後一個新的國家被建造出來，婦女運動走了一段從傳統的內/外之別轉變而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公領域、私領域的交涉⁴⁶。

（三）

在進行政治與性別關係的研究時，有必要先介紹 Lynn Hunt 研究法國革命史時所提出一個關於政治與文化關係的概念，即革命者重構社會和社會關係的設計。革命最顯著的結果是與過去決裂而重塑一個意識型態，而革命經驗中如果有任何一致與統合存在，那就是來自一個共有價值和對行為的共同期望。價值、期望和伏藏的規訓傳達和形塑集體意向，這就是革命的政治文化⁴⁷。Lynn Hunt 雖然未曾將性別當作革命文化中的一環列入討論，但他的研究對於超越過去僅將政治研究限於政黨、意識型態、群眾運動、或是政治訴求等，無疑地提供新的視角。

性別也是各種社會關係交會時權力展現的一個場域⁴⁸，政治中的性別也是一種文化實踐型態。自清末以來的救國論述不斷整編婦女進入救國序列，各種性別再現一直處於中國革命宣傳的中心，一方面將性別（婦女）描述成爲一個等待被改造的集體，另一方面又將婦女視作符號，採取身體政治的換喻，通過婦女這個符號具體化

版社，1986），頁33。

⁴⁵ 公領域對於私領域的入侵，以革命男女的情感糾葛最為引人注目。這方面的研究參閱呂芳上，〈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92年），頁73-102。

⁴⁶ 根據安徽省黨部訓練部1929年關於婦女運動整理的報告中，提到「占有口半數的婦女同胞呢，更受宗法社會的重重壓迫，奴顏卑膝好像受了命運的制裁，必須過這非人類的生活，經濟既不能獨立，同時便成社會的寄生蟲，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最高目的在求人民的經濟地位相等」，前半段對婦女地位的描述承襲五四用語，後半段則將女權提升移為政治資源。引自《國民黨安徽省黨部訓練部工作報告，十八年份》，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722/732。

⁴⁷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0-16.

⁴⁸ "Introductio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中國國族的衰弱、癱瘓⁴⁹，19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投注於對國族命運的摸索而試圖尋找國族的永恆不變本質和道德純正性的落腳處時，在婦女的精神及身體上形成一個重要的基址⁵⁰。

近年來的第三世界的性別研究，提出有關女性主義與國族運動結合的困窘，而婦女運動的發展逃不過臣服國族國家統一運動的命運⁵¹，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挑戰而興起的女權思潮亦可證諸此種傾向。在質疑傳統婦女形象與作為不能適合現代國家求強的目的下，西方婦女成為對照的另一端，故女權思潮往往隱含一種向西方學習的訴求⁵²，為恐懼西方而摹仿西方，這種矛盾的悖論在女權思想中特別顯著。

女權運動的一個「現代性」即是婦女參政，有別於傳統婦女沒有機會參與政治⁵³，革命替婦女打造一個公共政治活動空間，但也隨之產生各種典範式婦女。這源於在為婦女進入政治領域建立一套深入人心並且不被質疑的論述之時，最為有效的還是應用傳統的大義、公理、群益等號召，以做為改變婦女地位的合理憑證⁵⁴。這個模態建立之後，對於婦女解放的追求很容易轉變為爭奪論述的霸權，而對於真實存在的個別婦女自主、自由的選擇，則在全體論述中被刪節、忽略或者除名，婦女運動

⁴⁹ 將婦女纏足換喻成為中國之弱，如黃鶴生語「中國亙古未有之奇病一，曰纏足」，〈中國纏足一病實阻自強之機並筆將來不測禍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36。

⁵⁰ Prasenjit Duara, "Of Authenticity and Woma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 in Wen-shin Ye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342-347.

⁵¹ Samita Sen, "Motherhood and Mothercraf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 *Gender and History*, no.5, (Summer 1993), pp.231-243.

⁵² 如「現今美洲之女界，已達極點，吾國即能與並駕齊驅，亦可矣」之語。楚南女子，〈中國女子之前途〉，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上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4年），頁395。

⁵³ 少數婦女的參政，是為女主。見楊聯陞，〈中國歷史上的女主〉，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68年），頁63-78。

⁵⁴ Charlotte Beaha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1911", *Modern China*, vol.1, no.4, p.384.

的弔詭至1920年代最為顯著，所顯示出即是婦女運動的高漲與失落同時並現⁵⁵。關於這個中國婦女運動的特殊經驗，也正是筆者認為值得再加以探討的地方。

過去有關中國革命婦女的研究，中文方面的論著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據時間分段完成的研究，重要者包括林維紅、鮑家麟對於辛亥革命婦女的研究，呂芳上對於五四至革命時期的青年婦女研究，張玉法有關五四家庭思想的研究，李又寧、游鑑明、梁惠錦、王正華有關國民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研究、張錦堂對廣東婦運的研究⁵⁶，第二部分則是通史性的論著，主要有陳三井主編之《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呂美頤、鄭永福著之《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劉巨才之《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馬庚存之《中國近代婦女史》等專著，上述各類論著內容囊括了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社會、文化、政治各方面的變遷，而其結論明顯呈現出的是中國婦運的時代變動，指出的共同趨向是肯定中國婦女運動進程朝向一個直線進步的方向，但問題在於如果專從性別/政治角度著眼，那麼不禁要問各書所描繪的婦運圖景，究竟是「誰」的理想？那些婦運的歷程總是讓人疑慮著「女人」在那裏？也就是說，從清末以降隨愛國運動升降的婦運，真得賦予婦女掌握女權發聲的主體位置嗎？還是女權及婦女運動的各種發展是被政治權力召喚出來的呢？隨著革命風潮的襲捲，在政治力愈來愈趨強烈的操縱下，性別議題還能忠實地呈現出婦女的真正需要嗎？各個時代轉變下醞釀的諸多女權主張一旦被政治力吸納，婦運是否會因為得到一定的保障而削弱向父權抗爭的獨立姿態呢？抑或由於政治的介入而開出新的婦運主題呢？中國近代的婦運真得衝決了傳統儒家秩序對於婦女的社會性別角色設定了嗎？現代國家難道真得揚棄了男尊/女卑的社會統治格局了嗎？還是從清末以來開展的女權運動，只不過走到了由國家接收婦女解放成果藉以合法化政權統治基礎的路途？有關這些縈繞於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中的反控經驗似乎在各種論著中皆付之闕如，換句話說，從性別角度而非國家、政黨的立場出發來檢視中國婦運，正是筆者對

⁵⁵ Roxane Witke, "Woman as Politician in China of the 1920s",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p.33.

⁵⁶ 所有研究相關論文，參閱徵引書目。

於近代革命/性別問題重新思考的主要脈絡。

至於西方的論著，其關注主要集中於婦女的政治參與⁵⁷，第一代女革命者對於建立共和國的貢獻⁵⁸、五四運動中的女權運動者⁵⁹、共產革命中的婦女運動⁶⁰。198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以社會主義和婦女運動的關聯再分析中國婦女運動，得出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是一個不滿意的婚姻⁶¹。這個研究取向基本上太過強調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大致循著這樣一個解釋架構——五四時期青年共產黨員熱烈擁抱各種女權主張，包括婚姻自主、社交公開、廢除一夫多妻與娼妓制，這些在革命的過程中遭到父權的反撲，只好先放棄較為激烈的結婚、離婚自由、而最後改變成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挖掘婦女的生產勞動力為國家所用⁶²。這個研究架構成立的條件在於聲稱中國革命中階級與性別扞格不入，但如果從政黨的角度來看階級和性別都只是政治權力顯現一個媒介，更何況一個更高的建立國家（state-making）的遠景在統攝著所有的革命參與者。所以應該強調的不是性別與階級的衝突，而是政黨如何表述性別以作為自己權力合法化的說帖，當然，性別表述又反向地透過政黨來掌控「恆真」的婦女屬性最後達成婦女自我意識的塑造⁶³。

⁵⁷ 西方在1970年代開始對中國婦女史從事研究，最初以婦女政治活動為主。Ono Kazuko, Joshua A. Fogel ed.,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⁵⁸ Charlotte Beah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Ann Arbor: Ph. D. Disserta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76).

⁵⁹ Roxane Witk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⁶⁰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⁶¹ Elisabeth Croll, "Introducti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in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pp.1-11.

⁶² "Introductio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t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p.19.

⁶³ 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37, no.3, (1998), p.299-306. 杜贊奇認為十九世紀以降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在對待婦女問題上，表現出一種「國族主義父權」（nationalism patriarchy），其表述方式即以婦女做為「恆本永真」（authenticity）的核心，透過攀援某些歷史再現（例如傳統婦女的自我犧牲精神）來規訓在公共領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運用性別的觀點分析共產黨在1920年代接受五四新文化對傳統與封建禮教和社會的批判，並認知到轉變傳統文化與政治變革是分不開的。他們關注以平等原則重建社會關係，因而致力於自由戀愛的結婚方式，所以組的政黨不但是革命政治組織，同時形成一個激進社會實驗的次文化。如同作者所言，相對於過去的研究中著重中共黨內宣言、決策、及中央委員會的指導、黨員大會的召開等，她更重視是黨生活和政綱中的意識型態、文化及社會的各方面⁶⁴。她試圖擺脫社會主義對於女性主義的糾纏，提出中國特殊的國族主義與婦女運動的組合在政治文化中影響深遠⁶⁵。Gilmartin 的看法的確帶來研究視角的位移，不過她將焦點集中於中共黨中的性別關係、婦女政綱、及大規模動員中的婦女角色，結論是女權主義（feminism）對於國共聯合的革命產生重要的影響⁶⁶，這個觀點仍然隱示著將社會主義輸入中國當作婦女運動的劃時代轉變的契機，忽略中國自清末發軔的婦女參與革命的內在脈絡，婦女角色的定位是多重交叉論述的結果，權力來源包括男性知識菁英、女性知識菁英、家庭、社會團體、國家⁶⁷，而婦女政治意識的覺醒是由於國族主義的召喚，這種帶著強迫性的改造，是革命政治中涉及的文化爭議的最核心的組成。筆者還是認為中國的國族如何與婦女運動勾聯，這個問題必須回溯清末在保守與激進思想對於女權的想像中尋找源頭，而第一代女革命者採取的回應方式，影響到後來的婦女運動方向。當然，五四新文化運動關於婦女解放的論述引入更多變因，對婦女運動最有助進的是挑戰家庭的束縛，第二代女革命者承接五四反抗傳統、反抗封建的贈與，另一方面又捲入革命的潮流中，一旦遭到政治力量的強力介入，

域中的婦女以做為某種國族精髓（national essence）的象徵，這種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婦女亦可名之為「架構於現代性中的傳統靈魂」（the soul of tradition-within-modernity）。

⁶⁴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 in the 1920s*, p.2.

⁶⁵ *Ibid.*, pp.5-8.

⁶⁶ *Ibid.*, p.3.

⁶⁷ "Introductio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t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p.1.

女權還能留有多少清末初興時的面貌？尤其是北伐高舉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兩個目標，婦運豈不是處於不能中（軍閥等於舊傳統）復不能西（西方等於帝國主義）的進退失據嗎？如此一來不就只能仰賴新興的國家權力為其解圍？這些是過去研究中國婦女運動較少被注意到的，到底中國婦女解放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正是筆者真正措意之處。

第二章 從閩秀到女傑：晚清革命中的性別再造

第一節 母強與國強的想像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為追求國家富強的目標，往往描繪一種超越所處時代的現代化（西化）藍圖，提出進步願景，在這種思慮中，首先面臨的挑戰是，所有改革的「政治意圖」的合理正當性必須得到確認，那些「未來」目標如何在「當下」推銷成功，最有效的說服技巧是操縱傳統尋求奧援。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對於提倡現代化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研究，指出他們的言說往往挪用固有文化的某些符號、概念及習俗用以建構「傳統」，這種傳統其實是一種再構的形象，是用推論得來的認識（epistemologically derivative），一旦在現代化論述中被重新組織成爲一個新範疇及假定，那麼即可被某種目的所利用¹，顯然所有「再構傳統」的結果包含了試圖說服民眾的企望、也反應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困境。

分析以強國為目標的維新運動全盤改革議程中，開明派的維新言論不乏改造婦女的言說。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關婦女問題的討論及呼籲女子啓蒙的重要性，都以所謂「現代」作為準繩標尺。弔詭的是，這些改革人士的影響力來自於其仍舊依附於傳統社會結構下，甚至仰賴固有的以官紳言說為主要知識來源這種文化基礎上。處於中國社會嚴格的階層劃分中，官紳向來佔有優越的發聲位置，往往引領社會變遷正是所謂「士」階層，他們的話語、言論、觀點經常轉化成為道德訓示和普遍價值，這種帝制時期知識體系的重要特質被維新人士所承襲了，也就是說即使他們現在以部分傳統為抨擊對象，但當社會條件尚未提供援助時，他們根本無法超脫傳

¹ 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Feb. 1991),p.8.

統，此即考量維新變法改革目標的設定及改革幅度的估計時，不可忽略的要素。

以康有為為例，他嚴厲批判程朱理學，攻擊傳統倫理道德，指出在三綱禁錮、名分限制、義理桎梏下的婦女有無量數的苦，其處境比身繫牢獄還要不堪，進一步而言，康氏自陳他是替中國受壓迫女子呼彌天之冤，且看他如何代言：

抑之、制之，愚之、閉之、囚之、繫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為仕官，不得為國民，不得預議會，甚且不得事學問，不得發言論，不得達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預享宴，不得出觀游，不得出室門。甚且斲束其腰，蒙蓋其面，削其足，彫刻其身，遍屈無辜，遍刑無罪，斯尤無道之至甚者矣。²上引的這段文字中，康有為刻劃傳統專制對於婦女採取的各種防微杜漸的限制，固然流露他對女子遭遇的同情，但更多的成份是作為康氏大同世界理想的對照，是一個追求社會改革的訴狀。再者，傳統仍然在他身上不斷糾纏，使他對於女權的主張必須以「未來世界」來包裝³。康有為解釋公羊學說，提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的說法，三個階段文明逐步進化最終到達完美的境地，此即大同世界，至此男女平等、家庭不再成為限制，但在太平世來到之前，對待婦女仍然不能給與過多的自由，否則她們會反抗丈夫、淫心肆起，最後導致世界混亂⁴。康有為三世的構想中表達出他充滿矛盾的女權思想，因為其不僅表達了超越當時社會現實激進的一面，卻又透露出他對於婦女解放保持的審慎猶疑⁵。

當時對女權啟蒙最有影響力的應屬梁啟超，梁氏於 1896 年（光緒 22 年）在上

² 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中華書店，1935 年），頁 193。

³ 學者謂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極盡幻想之能事」。見王樹槐，〈康有為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 期（1994 年 6 月），頁 31。

⁴ 原文為「若今女學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婦女獨立之例，以縱其背夫淫欲之情，是大亂之道也」，引自康有為，《大同書》，頁 253。

⁵ 大同書的內容多半完成於 1884 至 1902 年之間，但康有為似乎察覺其內容的激進而無意於當時盡刊其書，是以該書的內容並不被晚清及民國初年的學者熟悉，可能只在他的弟子之中流傳，全書完整版本於 1932 年面世。Charlotte L. Beah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p.90.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康有為激進的女權觀，只能做為他個人思想的一個歷史文獻，與維新運動的實際女權改革之間有一些落差。

海主編《時務報》，與黃遵憲、康有為、譚嗣同等多所聯繫，其有關婦女問題的討論即出現於這個時期的改革主張中，特別是對於女子教育的提倡。在《變法通議》〈論女學〉篇中，梁氏將女學盛衰與國家強弱相聯，換句話說，女學不是單獨存在的改革目標，而是臣服於國家興存的一項舉措。梁啟超舉西方國家強弱處境為例，說到「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⁶。既然西國已有先例在前，可見勢不可違。除此而外，為力陳變法維新的正當性，梁啟超還引述經典中的話語作為改革的陳情書，如引《易經》之說，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于是豪杰之士，毅然思所以易之者」⁷；賢哲之言亦成倡興女教注腳，所謂「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非有歧矣」⁸。梁氏勸興女教說不僅以西方為借鏡，還有攀古的題材，更重要的是加入國家興亡的新時代議題，如「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⁹，這樣高明的說服技巧，對於推動女學興辦不可不謂是居功厥偉¹⁰，而梁啟超的女權思想在很長時期影響著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方向及特質。他將中國女子遭遇不平等的原因歸於男子的歧視：

男子之強悍者相率而倡扶陽抑陰說。盡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類相待，是故塵塵五洲，莽莽萬古，賢哲如鯽，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為女子計，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說，則豢之若犬馬。由後之說，則飾之若花鳥。¹¹

⁶ 梁啟超，〈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頁 33。

⁷ 梁啟超，〈戒纏足會敘〉，同前書，頁 80。

⁸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同前書，頁 104。

⁹ 梁啟超，〈戒纏足會敘〉，同前書，頁 80。

¹⁰ 他有關女子教育的論述最多。呂美頤、鄭永福，《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 85。

¹¹ 梁啟超，〈戒纏足會敘〉，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頁 80。

顯然，這番苦心詣旨的讖言係以男性為說教對象，並非直接鼓勵婦女自身起來進行解放。也就是說，檢視清末男權主導下的女權啓蒙，始終未曾獨立於男性政治集團開出的救國方案選項，並且由男子主導的結果，婦女是改革的客體不是主體。揆諸梁啓超的言論不啻表達了時代限制下，維新派女權觀在傳統頑強不變與現實政治拘限中困難前行的處境。

處於同時代的另一位維新成員譚嗣同，雖則在改革派中具有最激越的女權思想，但仍然無法突破社會現實的包圍。譚氏來自一個宦宦家庭¹²，與當代人相較，其思想顯得十分駁雜¹³，關心的女子問題也較廣泛。如談到中國傳統性關係時，譚氏在〈仁學〉中指出，男女之間的差異本微乎極微，而男女嚴防的作法則將這種微小差異擴大，遂易促起淫念，如果明瞭「男女同為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為淫始生於世」¹⁴，則「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中國人對性「以為禁為恥為諱」的態度反而助長淫風¹⁵。而譚嗣同在闡述其思想中心「仁」時，更將其直接作為人性論及宇宙論的唯一依歸，而體現「仁」的方式，不外乎「通」，所謂「仁以通為第一義」¹⁶，是因為他覺得中國傳統社會充滿壅塞與隔閡，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無法充分地交流，心靈無法彼此溝通¹⁷。由此，他不僅攻擊中國的三綱倫理，更表露出一種超越時代的激進，即對婚姻制度的懷疑：

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漠不相關之人，繫之終身，以為夫婦，夫果何恃以

¹² 譚嗣同在維新運動時期，主持湖南的改革事務，後於1898年犧牲，死時年僅33歲。Ono Kazuko, Joshua A. Fogel ed.,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p.34.

¹³ 根據張灝的研究，認為「仁」在譚嗣同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正是體現他受到張載、王夫之這一思想傳承的影響。另外 Ono Kazuko 發覺譚嗣同思想中除了發展出對於儒家道德的尖銳批判外，更觸及了有關性別與人道之間最基本的相關問題，而〈仁學〉的內容表現了這種獨特的議論。其思想中摻雜了新和舊、東方和西方、佛教和禪宗思想、基督教教義、墨子兼愛、及數學、物理等理論。見張灝，《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77年），頁89-129。及 Ono Kazuko, Joshua A. Fogel ed.,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pp.34-35.

¹⁴ 〈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04。

¹⁵ 同前註，頁304。

¹⁶ 〈仁學界說〉，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頁291。

¹⁷ 張灝，《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頁123。

伸其偏權而相若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¹⁸

另一位改革派的思想家嚴復，則闡揚天賦人權的觀點。他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uller）的《論自由》（on Liberty）¹⁹一書譯成中文，嚴氏譯該書的目的透露了移借穆勒學說來定義個人自由的企圖。因為原作者穆勒並不將個人自由看作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即為目的，而嚴復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富強目標的途徑²⁰。與其他維新份子相較，嚴復更加明顯地援引西方學說來闡釋變通思想乃中外共通²¹，露骨地將國家強大標舉成無限上綱來合理化了各種追求富強的手段，他的思想包含著一種顯著的時代特徵，這種集體趨勢也反應在其他維新改革分子的思想中。即縱使個別的女權主張有異，顯示出的卻是殊途同歸的政治考量。

面對世變之亟的局勢，維新派從興女學之籲到廢纏足的提倡皆脫不了強國的目標，梁啓超著手於改革事業甚至是從甲午戰敗後開始²²，其倡女學的議論處處流露挽頹拯溺的心跡：

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學校之議，騰于朝廡，學堂之址，踵于都會，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未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無亦守扶陽抑陰之舊習，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眾程課，共襄美舉，建堂海上，為天下倡，區區一學，萬不裨一，獨掌堽河，

¹⁸ 〈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頁348-349。

¹⁹ Benjamin Schwartz 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頁123-125。

²⁰ 晚清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另一種創作，特別是在「強國保種」的時代危機感驅策下所進行的翻譯工作。透過翻譯行為、作品的研究，對瞭解跨國之間思想和文化交流是很大的突破。關於翻譯理論參考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²¹ 晚清變法家用傳統思想模式，古典詞彙來說明新說，按照汪榮祖的看法，認為彼輩原是受傳統教育之知識分子；而且亦有其必要，因非如此，新說便難以滲透舊思想界。參見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79年），頁6。

²² Philip Huang, "Liang Ch'i-ch'ao: the Idea of the New Citizen and the Influence of Meiji Japan", in David C. Buxbaum ed.,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ongkong: Chahay Press, 1972), p.71.

吾亦知其難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風，拯二兆人之吁命，力雖孤微，烏可以已。²³ 上述的女權主張顯然也可以看作是知識分子擊劃國族強大藍圖中的一個拼塊。

反對婦女纏足的身體改造運動中，夾雜著更多有關國族強大的想像。康有為於在 1898 年（光緒 24 年）上光緒皇帝的奏疏中以「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譏輕，非復一統閉關之時矣」，「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回觀吾國之民，鳩弱纖儂，為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今當國舉國徵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²⁴。特別是對日戰敗後，朝野因社稷受辱所激起的危機感，各方對於國家強盛的籲求愈益迫切，不纏足會的組織也在這種振衰起弊的風潮下，以滄雪國仇為前提而備受注意：

甲午之役，我國兵刃未交，大軍全墨，割地輸幣，城下行成，釀中國五千年以來未有之奇恥。談者輒歸咎兵器利鈍，顯已分中日之勢。細人竊謂我中國實坐雕琢緣飾弊，乃有以至此。自此之後，方謂朝野上下，知巨創，知深痛，如病大復，如夢大覺，如見嚴師，如遇勝友，如驅頑冥之子弟，操鞭箠日從其後，欲不遽然悟，矍然興，而勢且不得，或者一洗從前相師相市相競相勝之秕習，以漸冀挽回補救於萬有一日。……善乎，粵中賴、陳兩君子，乃於上海創不纏足之會也。兩君之言曰：“吾痛中國士夫心術之亡也，性命之地，肝膽之際，不可共見也，無有滌滌之者也。其在身體之末，髮膚之細，則僻躄痛戚而不辭，忍死百年而不悔也”。兩君又言曰：“中國矜情作偽，痼疾之深也，世俗二三愚民，吾無責焉。若王公貴人之列，覩焉操易移風俗之權者，日惟起居口齒之奉，不若人為恥，而他俱非所知也”。²⁵

女子纏足之風非一朝一夕的社會現象，而是歷經幾百年的習俗衍成，圍繞著纏足形

²³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頁 104。

²⁴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引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65、66。

²⁵ 趙祖德，〈記不纏足會〉，《時務報》第 45 冊，1897 年 11 月 15 日。其中提及的粵中賴、陳兩君子應是指陳默庵、賴弼彤，二者於 1896 年（光緒 22 年）在廣東龍山成立龍山戒纏足會。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著，《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下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頁 846。

成的一套文化：包括文藝、情色、性別樣版、服飾穿著等等²⁶，並不是視之為惡俗能夠總結評論，更非短時期就能被拋棄的慣習。以此來檢視清末改革派從國家危機出發而嚴厲批判纏足，將其徹底污名化，所採取的施行方式並未真正全盤考慮女子身體與處境的聯繫，各種反纏足的論說與其說助成女權追求，其實更近於借女子身體傳達改革的規劃。

時人描述朝野京官對於禁纏足一事，是「同聲廣和，雖守舊者千百，謀新者什一，而其機固已動矣」²⁷，如此普受支持實有其政治背景。禁止纏足是大清立國以來確立的社會改革政策之一，所謂「大清定鼎以來，男令薙髮，女禁裹足，因薙髮已遵國制，而裹足亦無甚關係，後亦不究民俗，相沿至今未改」²⁸，可見民間纏足之風盛行，禁之甚難。官方甚且屢次頒訂科纏足刑罰的律令，清廷於 1660 年（順治 17 年）已有「纏足者罪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²⁹的諭令，1664 年（康熙 3 年）奉上諭下：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³⁰

該法令失之嚴苛，牽連無辜，而竟中止。此後直至道光年間，朝廷再頒發另一個諭令，這次是直接訴諸上層階級放足以鼓動其他民眾效法來消除纏足之俗³¹，此外，專

²⁶ 纏足文化的研究，參見 Dorothy Ko, *Every Step at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²⁷ 江都王景沂來稿，〈駁不纏足會議〉，《時務報》第 61 冊，1898 年 5 月 20 日。

²⁸ 〈裹足論〉，《萬國公報》卷 11，（1878-1879），頁 30-31。

²⁹ 黃遵憲，〈泉憲告示〉，《湘報》第 55 號，1898 年 5 月 9 日。梁啟超的言論中也推崇 1660 年（順治 17 年）的戒纏足令，認為「大哉王言，將救此一方民矣。徒以舊污太深，奉行不力，沿謬蹈蔽，仍數百年」。見梁啟超，〈戒纏足會敘〉，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第 1 卷，頁 80。

³⁰ 〈女教〉，鄭觀應，《盛世危言》卷 8，（台北：中華雜誌社，民國 54 年），頁 22。

³¹ 賈伸，《中華婦女纏足考》，頁 11。引自 Howard S. 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門約束上層階級的法令還有一條，即 1871 年（同治 10 年）部議，如有官民婦女因纏足致死卑幼及白契婢女，罪應絞候³²。

在帝制專權統治下，官方運用罪罰手段來抑制民間纏足之風，各種廢纏足的政令是以化民和移風易俗為訴求而頒布的，傳達的是統治者仁政愛民的作為，同時，立法禁惡俗也可以視作是帝國權威的施展，具有維護統治基礎的作用³³。這種方式仍反應在維新改革派對於廢纏足的推行上，如籲求官方訂立更嚴格的律法，包括纏足婦女不得受封，而強人纏足者，初犯鯨面、再犯截指³⁴。但是有別於以往有關纏足停留在移風易俗的考慮上，在國勢陵夷、列強不斷挑戰的危機下，變法人士在申論廢纏足之必要時注入更強烈的期待，此即為對於國族未來強大的想像。如康有為的言論中，表現出的即有別於傳統的方式，而用母強與國強的聯繫來反對裹足：

國朝龍興，嚴禁裹足，故滿洲婦女，皆尚天足，凡在國民，國隸覆幬，率土婦女，尤宜哀矜。且法律宜一，風俗宜同。皇上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乞特下明詔，嚴禁婦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寬解。若有違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錢罰。其十二歲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如此，則風行草偃，惡俗自革，舉國弱女，皆能全體，中國傳種，漸可致強，外人野蠻之譏，可以銷釋。³⁵

中國第一個反纏足的組織是由廈門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的光

Custom, (New York: Bell Publishing Co., 1967), p. 68.

³² 黃遵憲，〈臬憲告示〉，《湘報》第 55 號，1898 年 5 月 9 日。

³³ Mark Elvin 提出大部分統治者是透過象徵某種社會地位和特殊榮譽的「符號」來統治人民，透過那些符號，賦予某一類社會行為尊榮的印象，以與其他相異者表示區別，這套運作能對於社會及政治行為產生極大的影響。基本上，中國的統治者也運用這種方式來貫徹官方意志。Mark Elvin, "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no. 104, p. 111.

³⁴ 黃鵠生，〈中國纏足一病實阻自強之機並筆將來不測之禍說〉，《時務報》第 35 冊，1897 年 7 月 11 日。

³⁵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摺〉，引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67。

照牧師（Rev. John Mageowan）建立的³⁶，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主編的《萬國公報》是當時各種反纏足言論最重要的發表園地，許多言論的觀點不外乎指認纏足是中國獨有的風俗，西方人見之無不視為野蠻而為之駭然，「按地球幾百國，猶中國有纏足之俗，殊出情理之外，而乍見乍聞者，莫不驚駭，雖中國習慣自然，毫不為怪，已大非疇王之制」³⁷。由於中西接觸的頻繁，許多維新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批判，間接折射了外人的觀點。他們普遍接受纏足是「國族之恥」的說法，如鄭觀應即言「西人論女子裹足，男子官刑乃極弊之政，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無，宜為彼族嗤笑，革之者真為聖君賢相矣」³⁸。也可以說，維新派在纏足問題上的立場與傳教士的看法是較為相似的。當時中國學者往往直接引用西方人的觀察，藉用西方觀點激起國恥感，可是又處處對於西方勢力進入中國懷抱著戒慎，形成一種複雜矛盾的心理狀態。因為「西方」被認作是中國的威脅者及模仿對象，知識分子一方面認同「外人」對中國所做出的一種近乎貶抑但含有極強辨識性的文化描述，為此還設定計劃改造自己，改造的目標即宗法「西人」，但事實上，中國又極為痛恨那些西方威脅者的入侵。如此吊詭的雙重操縱，同樣反應在士紳對待纏足問題的主角——廣大的婦女身上，一方面以西方婦女為準的來設定中國婦女的改造，另一方面對於婦女的傳統性別角色及連帶任務又加重加深，視婦女為護持中國倫理關係及固有道德的重要核心。在這層層操作轉換下，「婦女」不再只是一個社會中的性別集體，而是被挪用為轉喻國家危亡的具體符指，改革派利用此種換喻，使婦女遭遇及婦女問題成為喚起國家集體危境的媒介。

在傳達中國面臨列強侵略國勢危如累卵的處境時，放大纏足婦女柔弱的形象，一方面使改造婦女的動機合法化，另一方面則警示一旦戰亂發生，中國婦女必定犧

³⁶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90。另根據 Charlotte L. Beah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p. 133. 提到廈門第一個反纏足會成立於 1874 年，而中國人第一個反纏足會則由康有為於 1883 年組成。

³⁷ 英傳教士秀耀春，〈纏足論衍義〉，李又寧、張玉法編著，《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上冊，頁 486-487。

³⁸ 〈女教〉，鄭觀應，《盛世危言》卷 8，頁 21。

性慘重，顯見國家的危機迫在眉睫，不思求變即唯有坐以待斃。最典型的描述，莫如黃鵠生的〈中國纏足一病實阻中國自強之機並肇將來不測禍說〉：

無事之時，纏足者雖生猶死，值有事之日，則纏足者決死不生，已見于粵捻之亂矣。東南十省小足婦女，一遇賊無不死者，什九皆赴井飲刃，投繯服藥，先期自裁；即或有路而逃生，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望。蓋不纏足，或猶尚可逃，一纏足則更無可逃也。此時財盡民窮，伏莽會匪，遍于海內，敵國外患，迭起相乘，萬一或有變端，則中國萬萬纏足之才智婦人，竊恐皆無生路矣。³⁹

事實上，中國女權啓蒙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刻，決定了它是一個不可能獨立存在的權利追求運動。在清末時代氛圍籠罩下，婦女問題被看做是其他國家危機的一個環節已成爲典型女權論述架構，如張之洞將纏足與物質生產作聯結，性別與經濟並立考量：

禹跡九州之內，自荒服狹鄉極貧下戶外，婦女無不纏足者。農工商賈改漁轉移職事之業，不得執一焉！或坐而衣食，或為刺繡玩好無益之事；即有職業者，尫弱頃側，跼蹐卻曲，不能直立，不任負載，不利走趨，所作之工，五不當一。⁴⁰

顯然，張氏完全略過纏足對於婦女生命經驗所具有的意義，而將它移作是中國經濟落後的肇因。仔細分析張之洞的言論，不難察覺原本只屬於婦女身體的一個徵象，卻在其上搬演了許多重大國家議題。張氏立論的前提根本忽略性別、個人差異，而是虛構了一個全體平等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說，假設所有婦女纏足全部被廢止，中國經濟處境即會好轉，因爲婦女理所當然都成爲生產者，都能進入各種行業中。但揆諸當時的社會條件，男尊女卑的社會秩序固若磐石，大部分婦女概屬文盲，對於教育權的爭取尚在蒙昧之中，更惶論工作權的獲得，總之，女子能否執業牽涉到經

³⁹ 黃鵠生，〈中國纏足一病實阻中國自強之機並肇將來不測禍說〉，《時務報》第35冊，1897年7月11日。

⁴⁰ 張之洞，〈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敘〉，《時務報》第38冊，1897年8月11日。

濟環境的變遷、社會觀念的改變等因素⁴¹，單責某一種習俗，有失實之嫌，但張之洞的說法，卻促使廢纏足的倡行有了更複雜的社會意義。像張之洞這類士紳的女權學說，其影響對象恐怕不是性別區劃中真正的主角——那些一個個真實存在的「婦女」，而是男性菁英階級。也就是說，有關廢纏足的種種宣導，就不能只看作是女權意識的表現，其操縱的手法，也不只是表面上重視婦女問題的解釋而已。

向男性菁英發聲的典型模式，首先訴諸學理，確立廢纏足運動的正義合理性，其方式爲上溯援引遠古聖賢之說，力陳纏足之非。鄭觀應語及裹足不僅「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且莊子亦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豈可裹足」⁴²；甚至重新訂製婦德、婦容、婦工、婦言四者的標準，所謂「周官婦學之法曰，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所謂婦容，即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今行則踳踳，立則跛倚，婦容失矣！縲而弗織，婦工闕矣！問安視膳，因茲漸廢，而婦德亡矣！婦德亡，家政荒，大亂之道也」⁴³。這類引經據典的申述無非是證明古有名訓而加強立論說服力，同時亦希圖阻斷保守派的反對意見。其次，男性集體立會互相約束落實。1895年（光緒21年）康有爲與其弟康廣仁在廣東成立粵中不纏足會，影響所及致「粵風大移」⁴⁴。1897年（光緒23年）上海不纏足會設立，會務迅速發展⁴⁵。除此之外，甲午戰後各地紛紛出現不纏足會的組織⁴⁶，而據估不纏足會會員

⁴¹ 依照羅蘇文的研究，1860年代中期上海已步入都市化進程，隨著都市化的開展，上海婦女逐漸具有近代化女性的特徵，自養自立者增多，女工、女傭成爲新興的職業團體，《點石齋畫報》中以女工爲主題的社會新聞圖說增多。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85-94。

⁴²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8（女教），（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54年），頁21。

⁴³ 洪文治，〈戒纏足說〉，《湘報類纂》論著甲下，引自李又寧、張玉法編著，《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上冊，頁500。

⁴⁴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6，（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1年），頁230。

⁴⁵ 上海不纏足會（又名戒纏足會）由梁啟超、汪康年、鄒凌翰、張通典、吳樵、譚嗣同、龍澤厚、賴振寰、康廣仁、張壽波、麥孟華等人共同發起，會址設於時務報館，反纏足的言論多發表於《時務報》及《湘報》。見Charlotte L. Beahan,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p.134.

⁴⁶ 參見林秋敏，《近代中國的不纏足運動，1895-193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1月，頁51-52。